

于沛 周荣耀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学术论文集

1964—2004

·古代中世纪卷·

于沛 周荣耀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学术论文集

1964—2004

2 · 古代中世纪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于 沛 周荣耀

编 委 孙惠安 刘 军 李敦球
 吴必康 张顺洪 张晓华
 赵文洪 徐建新 黄立弗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李天勇 崔宪涛 郭沂涟
 夏 寅 冯慧茹

目 录

弥生中后期近畿地区生产力发展状况和邪马台国的

地理位置·····	汪向荣(1)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清教运动·····	徐晓光(25)
胡格诺战争·····	周以光(37)
论物质财富对古代马其顿王权消长的决定作用·····	朱建军(50)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财富观念的变化·····	张椿年(64)
从王政到共和	
——兼论罗马城市国家的形成过程·····	施治生(77)
美索布达米亚王权的兴起·····	杨 炽(93)
论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	李韵琴(112)
从元首制到君主制	
——罗马帝国专制主义的确立·····	王明毅(127)
试论日本早期王权的形成过程·····	徐建新(147)
奴隶占有制与国家·····	廖学盛(167)
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	
——(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	宋 峴(178)
中世纪英国议会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起源·····	赵文洪(193)
威尼斯贵族共和国·····	张春林(205)
脏卜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史料学·····	刘 健(213)
罗马平民起源问题初探·····	胡玉娟(223)
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	俞金尧(236)
古印度的种姓制·····	刘欣如(251)
16世纪英国社会等级状况例析·····	郭 方(272)
论古代民主与专制的定义问题·····	易建平(285)

弥生中后期近畿地区生产力发展状况 和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

汪向荣

汪向荣 1920年10月生于上海青浦县。1942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部东洋史科肄业。1979年至1987年1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为中日关系史,1980年2月为副研究员,历任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北京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撰有《中日交涉年表》、《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邪马台国》、《古代的日本与中国》、《日本教习》等专著多部。

一 问题的提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日本古代史的研究,凡涉及日本国家的权力形成和统一过程,主要依据的材料只有两种:一是出土的遗物和遗迹,另一是根据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①中的神话、传说。出土的遗物、遗迹虽然可靠,但只能说明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之内有过人类的某些活动,并不能说明该地区的全部历史。而《记》、《纪》中所载的神话、传

① 这里所说,是指日本最初用文字记载的史籍。虽然在《日本书纪》卷十二中说:“去来穗别天皇(履中)四年,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志。”卷二十二又载有推古朝修史的事。但这些史籍都没有留下,也无法证明其存在。至于以后所传的《先代旧事本纪》十卷,其序中虽称是推古朝所撰,但日本学者殆均认为是伪书,说是:“后人依托,非当时旧本。”(《大日本史》卷八注)。因此,现在均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作为现存日本用文字记载史籍之始。

说,不但都是事后的追记,而且其中还有些是套用中国典籍,照搬中国故事^①,很难遽信。

探讨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探讨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而且直接关系到日本古代史中最主要问题之一,即关于国家权力的形成和统一过程等问题的解决。

有关邪马台国问题的论争,方面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它的地理位置上。论争主要是由于对文献资料的解释和使用的不同而引起的。当然,文献的考证、解释是必要的,但今天其他有关学科的惊人进展,所提供的资料和根据也极丰富,完全可以用来判断和证明从文献中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因此在研究邪马台国问题时,必须从多方面加以探索,而不能局限在文献资料的论证解释上。

这里,我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试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探索一下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问题。

二 九州说和大和说

由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所以国际上许多东洋史学者和日本史学者,都曾对之加以研究和讨论。^②

学者们对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主要有九州说和大和说两种不同意见。前者主张邪马台国在日本列岛上的九州,后者却认为在近畿地区的大和。大和说者认为,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就是神功皇后,也就是后来被视为万世一系的皇室祖先;九州说者则认为,卑弥呼不过是那里一个部落(“国家”)的女酋而已。

日本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论争,由来已久;不过到1910年以后,论争更深入,两派的学者们都更进一步地从各种不同角度,做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有人把它称作明治史学界的成就之一^③,我认为这种提法,并非过誉。

古代日本最早用文字撰写的史籍《日本书纪》,就注意到了女王卑弥呼的事。《纪》在神功皇后摄政第39年、第40年、第43年的各条中,引用了

① 如《日本书纪》卷一,论天地由来一段,即系袭用《淮南子》、《三五历记》而来。

② 如 William George Aston (1841—1911), Basil Hall Chamberin (1850—1935) 等在他们有关日本史的论著中,都曾提到过。

③ 藤间生大:《埋着的金印》初版本,岩波书店1950年版。

《魏志·倭人传》中有关的记事。这表明在《纪》的编撰者心目中，卑弥呼 and 神功皇后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称谓，或者说是中国人对神功皇后的称呼。卑弥呼既然就是当时天皇的神功皇后，那么她所主持的邪马台国，必然就是大和朝廷。这种想法，一直到新井白石在《外国之事调书》中改变他原来的主张以前，没有什么人提出过疑问，即认为邪马台国是在近畿地区的大和。就是新井白石在《古史通或问》中，分析了《魏志·倭人传》中有关的里程，并比较了地名的古音等，得出“邪马台国即今之大和国也”的结论时，也认为卑弥呼“乃神功皇后之事”^①。后来，他才改变主张，提出邪马台国不在大和，而在筑后山门郡之说，成了九州说的首倡者。

主张邪马台国在九州最有力的，是稍后于新井的本居宣长。他认为《魏志·倭人传》的记载不正确，主张邪马台国是当时九州的一个“国家”，而不在大和；卑弥呼是当时在九州筑紫一带熊袭部落的女酋，她假冒神功之名，向中国纳贡受封，和大和朝廷根本无关。他这种论点，以后在其所著的《钳狂人》中，更加予以强调。本居宣长在邪马台国研究上所用的方法，虽和新井白石相似，但其出发点却是不同的。本居是日本国学派的首倡者，他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有一种先入观，即：万世一系的皇朝，绝不可能向其他国家称臣纳贡，受封受赐。因此，向汉、魏奉献纳贡，并受封赐印的，绝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和朝廷，而是边地土酋冒名所为。他还认为《日本书纪》神功皇后记中所引用的几条《魏志·倭人传》文字，是后人所掇入，并非原有。这种以政治上的考虑代替学术研究的做法，虽然受到了后人的批判、非议^②，但其影响还是很大的；近代的九州说者，除了在细枝末节与其有些不同以外，大多数人仍都认为邪马台国是当时九州的一个部落，或熊袭人的部落。像鹤峰戊申就从多方面肯定其是熊袭人的部落^③；近藤芳树则更称：“当时支配筑紫的熊袭族，窃天皇所都夜麻登之号，而名其所居为邪马台，自称倭王以通汉。”^④他还把后汉时接受金印的倭奴国比作琉球，说“倭奴盖冲绳之古音也”。虽然，早在他写《征韩起源》，提出这样主张之前十年，这块“倭奴国王”的金印，已在九州的志贺岛出土了。

① 《古史通或问》。

② 如藤间生大就在《埋着的金印》（初版本）中，批判了这种以政治观点代替学术观点的见解。

③ 鹤峰戊申：《袭国伪僭者》（1820年）。

④ 近藤芳树：《征韩起源》（1846年）。

在这些主张邪马台国在九州学者中，有些是属于国学派的，他们从皇室的威信出发，否认邪马台国与天皇所在的大和，有任何关联。可是，有一个国学派学者伴信友，却从另一角度来维护皇国的尊严，主张邪马台国应在大和，而不在九州。他说，神功皇后在得悉中国大陆上三国相争后，就准备乘乱出兵征服中国，因遣使（他认为是当时熟悉外事的伊都国王）诣魏，以窥测大陆上的实情。^①

中世纪，日本学者在邪马台国问题上的论争，只局限于少数人之间，影响不大。明治维新后，西欧的治史方法传到日本，被普遍地应用了；在邪马台国问题的研究上，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当时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是有关上古史的年代问题，至于对邪马台国的研究，还没有当作独立专题，只是在探讨日本上古史年代时有所涉及，因此影响有限。到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虎次郎）分别发表有关邪马台国不同论点的专文以后，此问题才又引起了日本史学界的注意。因此，有人把这一年称为邪马台国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一年。^②

白鸟和内藤两人在邪马台国问题上的不同论点，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可以说是九州说和大和说的代表。

持九州说的白鸟库吉（1865—1942年）在1901年出版的《东亚之光》第五卷第六、七期上发表《倭女王卑弥呼考》一文中指出：卑弥呼、邪马台国问题之不易解决，原因之一在于《魏志·倭人传》中所用里数的标准不一，又不合当时中国的尺度。在确定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时，他提出了三个标准：

（一）邪马台国位于不弥国之南；（二）自不弥国至邪马台国，须由有明海航行；（三）女王国（邪马台国）以南，有一名为狗奴国的大国在。

白鸟认为：“自后汉末年至三国时代，倭国即九州，分成南北两大国。北部是女王国（邪马台国）所领，南部则属狗奴国。女王所都的邪马台国，参酌《魏志·倭人传》中所载里数、日数以及行程，可以断言，是在其领域的西南部。”^③他还根据《魏志·倭人传》的记事中，极少提到女王国以东的情况这一点，推断说，当时大和朝廷的势力，还没有达到九州；否则，是绝不会被遗漏的。

① 伴信友：《中外经纬传草稿》（1806年）。

② 藤间生大：《埋着的金印》（初版本）。

③ 见白鸟库吉：《倭女王卑弥呼考》文。此文先发表于《东亚之光》（1910年），后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一卷中。

内藤湖南(1866—1934年)也在同一年版的《艺文》第一卷第二、第三和第四期上发表《卑弥呼考》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和白鸟库吉相反的观点,主张邪马台国在大和,不在九州。他致密地考证了原文中的人名、地名和官名之后,下结论说:“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则邪马台国之在大和,决无可异议之余地。”^①但他不同意把卑弥呼比作当时天皇的神功皇后,主张是倭姬命。

内藤把《倭名类聚抄》^②中一些郡、乡地名的发音,和《魏志·倭人传》中一系列国家名称的发音相比以后,认为这些“国家”大小不一,大的相当于村、乡,小的则不过是一个神社的所在地,两者相差极大。他又主张,这些“国家”的分布范围极广;也就是说,邪马台国的统治领域相当大,“恐较现在之大和国为大,殆包括当时朝廷所有之直辖地区”。^③

他们两人都认为《魏志·倭人传》原文中有某些错误,须加改正。如白鸟说,陆行一月当为“陆行一日”之误,而内藤则说,在中国古籍中,方向常有混错,《魏志·倭人传》中所记的方向,相差有90度,即南应作东。对这种改动古籍原始文献的事,不但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攻讦,且为后人所非议,被视为出自个人的需要而作的擅改。^④

到现在为止,日本学术界关于邪马台国论争中的两种论点,除个别细节以外,几没有超越上述两人的主张。因此,一般就以他们两人的论点,作为论争中不同意见的代表。

考古学者以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为根据,参加了这一论争,他们的结论虽也不脱离上述两种意见,但大多数倾向于大和说。尤其是富冈谦藏,梅原末治和现在的小林行雄一派,他们以出土的青铜器来说明公元以后(中国的三国时代)日本列岛上和中国大陆通交的情况,进而论证当时拥有极大势力的倭女王卑弥呼就是大和朝廷的主权者;因此,邪马台国,当然就是近畿的大和。^⑤另一个考古学者笠井新也更直接用《邪马台国者大和也》这样明显的标题发表论文^⑥,阐述他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史学界中,除了上述不同的两派外,还有少数以

① 内藤湖南的《卑弥呼考》文,先发表于1910年版的《艺文》,后收入《读史丛录》。

② 通称《和名抄》,935年左右成书。

③ 见内藤湖南:《卑弥呼考》。

④ 如松本清张等。

⑤ 梅原末治:《上代近畿文化的发达》,《思想》1922年第12期。

⑥ 笠井新也:《邪马台国者大和也》,《考古学杂志》1922年第12卷第7期。

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事研究的。他们从30年代起,就参加了这一论争,做出了贡献。他们认为《魏志·倭人传》是目前世界上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唯一宝贵文献。^①主张要从各方面作综合研究之后,才能确定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不能单凭文献学的推敲、考证。他们认为,从《魏志·倭人传》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公元3世纪前后的日本列岛社会结构和阶级情况等事实^②,这是考察的重点。他们为邪马台国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邪马台国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普及。从专家学者之间的讨论,发展成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其研究成果不但在专门学术刊物上发表,而且也成了通俗刊物、小说、戏剧乃至电视、广播的题材。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关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和卑弥呼是谁等问题,尚未得出定论。即令《魏志·倭人传》中所说的“亲魏倭王”金印出土,也未必能结束此项论争。^③

三 《魏志·倭人传》是重要文献

日本和中国,由于地理上相邻近,所以很早就有通往来,中国史籍中也理所当然的记载这些事实。这些记载,是今天研究日本古代史和中日两国关系史最可靠的根据。《三国志》所载的《魏志·倭人传》是中国正史中最早、最详尽记述日本列岛上情况的一篇^④,也是到目前为止,研究邪马台国

① 早川二郎:《大化改革的研究》,《历史科学》1933年11月第2卷第9期。

② 祢津正志:《原始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学研究》第4卷第5期。

③ 1976年2月号《历史公论》“围绕日本古代国家成立的诸问题”举行座谈会,直木孝次郎和井上光贞均发表了类似意见。

④ 中国正史《二十五史》记载日本列岛的事,列为专传的,由朝代的先后而论,应以《后汉书》为最先;但《后汉书》是刘宋时范曄所撰,而《三国志》的编撰者陈寿,是西晋时人。因此由成书的顺序说,《三国志》要比《后汉书》早一百五十年左右。再从内容上看,可以看出《后汉书·倭传》的记载,除最后部分外,都是根据《三国志》中《魏书》“倭人”条,略加改动而成。不但内容相若,甚至在某些文字上也完全相似。当然,从其改动情况看,相信范曄在撰述《后汉书·倭传》时,是另有根据的,除了文字上有变动外,还可以见有实质性的改易,没有具体根据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不过基本上还是根据《魏志·倭人传》的。因此说《魏志·倭人传》是现存讲述日本史前时代情况的唯一文献。《魏志·倭人传》的正式名称,应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的“倭人”条。为了避免和中国正史中另一《魏书》相混,东洋史学界一般称此传为《魏志·倭人传》,本文中也用此名称。

问题的唯一文献资料，因此受到珍视。

《魏志·倭人传》全文不很长，仅1987字，但涉及范围却极广泛，从地理位置、行政制度、风俗人情、规章组织、物产器具一直到当时两国间的遣使，通交情况都有记载。这篇记传是公元3世纪左右，即中国曹魏时，中国人记载的有关日本列岛上一些情况的唯一资料。公元3世纪前后，在日本还没有历史记载，一般称为“史前时代”或“阙史时代”，不唯没有文字记载，即口口相承的传说、神话也不多。今天想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历史，除了出土的遗物和历史遗迹可以约略地提供一些轮廓外，没有别的根据。可是，这篇出诸中国人手的《魏志·倭人传》，却能详尽地说明当时各方面的情况。

从《魏志·倭人传》记述的内容看，可以认为作者对当时日本列岛上情况的了解，是比较全面和清楚的，特别是对于对马（海）国^①、一支（大）国、末卢国、伊都国、奴国、不弥国和邪马台（壹）国七个“国家”，记述尤详；至于其他一些“国家”，则不过留下一个国名而已。他们有一个共主，即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在这女王统治的“国家”南面，还有个不属于女王统治，且与之不和，以男子为王的狗奴国。

《魏志·倭人传》的最后一段，记述了魏景初三年（239年）^②至正始八年（247年）间，中日两国通好交往的史实。

公元3世纪，在日本列岛上虽已有少数比较先进的地区，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但绝大多数地区，却仍滞留在原始社会，或正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魏志·倭人传》所记，正是当时这些比较先进地区的情况。

从《魏志·倭人传》所记的内容看来，其材料的来源，很大可能是根据曾出使日本列岛的（带方）郡使的报告，或到洛阳奉献的倭使们所述；有些，还可能是编撰者们目睹或耳闻的事实。《三国志》编撰者的陈寿和《魏书》所据祖本《魏略》的编撰者鱼豢，都曾在三国时出仕，并且都到过洛阳，很可能亲见或直接耳闻使节往来，至少他们也能见到有关档案资料。因

① 本文所引用的文字，是根据中华书局校订标点本；括号中的字，是不同版本中使用的。这里三个“国家”的不同名称，除邪马壹国有讨论余地外，其他对海、一大等，显系传抄、刊刻之误。至邪马台与邪马壹，因非本文涉及范围，故从略。本文中仍用邪马台一词。

② 原文作“景初二年”，但《日本书纪》所引，及《梁书·倭传》、《太平御览》均作“景初三年”。按汉于景初二年灭公孙渊，将带方郡改为直辖领，没有可能在这一年中遣吏将送倭使去京都的。因疑“景初二年”系“景初三年”之误。现在一般均认为应作三年，本文从之。

此《魏志·倭人传》中，一再使用现在时概念的“今”，和一般史籍的行文不同。因为编撰的时间和事情发生的时间，相距不远，所以《魏志·倭人传》的可信程度很高。尽管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记载中有失实、夸张乃至矛盾的地方，仍属不免。

把《魏志·倭人传》中的记载和今天日本列岛上出土的遗物、遗迹一相比较、对照，就可以知道传中所记的准确程度。因此，日本的史学家们从来都很推崇它的正确性；早在两个多世纪前的新井白石，在他致另一位学者佐久间洞岩的信中，就说：“《魏志》所记，盖实录也。”^①

就日本的历史时期论，《后汉书·倭传》所记，是弥生时代前、中期的事（其袭用《魏志·倭人传》内容，是另一件事，这里所说是指不同部分）；而《魏志·倭人传》谈的是弥生后期日本列岛上的情况。我们知道，公元前正是日本列岛上发生大变革的时期，从以采集经济为主的绳文时代，过渡、进化到农耕经济为主的弥生时代，而弥生中、后期更是列岛上主要地区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代。《后汉书·倭传》和《魏志·倭人传》中所记，就是反映当时列岛上最先进地区的概貌。弄清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对于研究中日关系史或日本古代史，是有重要意义的；尤其对于研究日本古代史中国国家权力的形成和统一过程等问题，意义更为重大。

四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邪马台国地理位置的关键

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魏志·倭人传》中说得很详尽，按理说，不应有所争论。但由于所用方向、里数、日程等标准不一，后人解释时有困难，这样就因为个人看法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论点。上面说过，这些相异论点的根据是对《魏志·倭人传》解释的不同所致。

中国正史的编撰原则，基本上是沿袭《史记》的，写作态度严肃，采用史料力求真实。《三国志》虽有曲笔阿时情况，但对和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夷”、“蛮”国家，还是能充分反映真实情况的。《魏

^① 1724年（日享保九年）闰四月下旬或五月初，新井白石给佐久间洞岩信中，提到去年水户（彰考馆）的史学者在谈及《魏志·倭人传》中倭国国名，主张是传闻之讹时，提出了他的看法。说这些记载，都是魏使往来见闻的记录；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魏志》所记，盖实录也。”

志·倭人传》之所以被日本史学界尊为“实录”，原因即在于其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弥生后期日本列岛上的各种情况。

弥生时代，在日本历史上是个划时代的阶段。生产落后而且长期停滞的绳文时代，日本列岛上始终以采集经济为主。亚洲大陆，主要是中国的先进文明，经常不断地从朝鲜半岛传入，使其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到公元前2、3世纪时，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高，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结束了长期落后停滞状态。弥生时代，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特征是：以种植水稻为中心的农耕经济的发展和金属器文化的发达。汉武帝设立四郡，直接经营朝鲜半岛的部分地区，对日本列岛上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变化是因地区而不同的；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并不平衡。《魏志·倭人传》所记，只是当时日本列岛上比较先进地区，即生产力比较发达地区的情况，而不是整个日本列岛。邪马台国是这些比较先进地区的代表。因此，在判定邪马台国地理位置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个关键因素。这点，可以从文献上知道，也可以从出土遗物、遗迹和其他方面来加以验证。

作为弥生时代特征的、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经济和金属器文化，都是从中国大陆经过朝鲜半岛而传去的先进文明。当其开始传到日本列岛时，最先接受的是地理上和朝鲜半岛相隔最近的北九州地区，经过一段时期后，才逐渐向东扩展。日本列岛上开始从原始的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可以说是从北九州起的。

今天在日本列岛上，到处可以见有石镞、石刀、钓针、铊和贝冢、竖穴等代表绳文时代的遗物出土和遗迹发见，就最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北九州地区，即和朝鲜半岛相距最近的九州北部，到公元前2、3世纪，即绳文末叶，弥生前期，由于受到不断传入的先进文明的刺激和影响，生产力有了发展和提高，因而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今天见到的北九州地区水稻农耕经济的遗迹^①，细形铜利器的存在^②，说明那时北九州地区已成为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区。同一时期，除了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偶尔有大陆移民传入一些先进技术和文化外，其他地区都远远落在后面；就是大和一带，也不能和北九州相比。因此，那时候和中国通交来往，并被载入中国史籍的倭国，作为代表日本列岛的“国家”，也是在北九州地区，而不是在

① 藤崎、板付、有田等遗迹，长浜贝冢。

② 板付田端遗迹、金隈遗迹。

其他地区。1784年福岡县志贺岛所发见的金印和汉镜、青铜器、铁器^①等随葬品的出土，证明了这一事实。

《后汉书·倭传》中所记公元57年（汉建武中元二年）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王的金印（“汉委奴国王”金印）于1784年在北九州地区主要的福岡县志贺岛出土。从出土情况看，虽然还有某些可疑之处；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和中国大陆往来，受后汉王朝封赐，被视为日本列岛上代表国家的倭奴国，其所在位置必不过远。此外，在北九州地区的须政、三云、井原遣沟和樱马场等遗迹中，发见大量汉镜和新莽的货泉等遗物，这都是不曾在其他地区见到过的。尽管这些镜鉴的入土时间，还无法肯定，但由其和铜剑、铜戈、铜矛等铜利器的同时出土情况论，可以知道，这些随葬品的入土，是早于近畿地区的铜铎，属于弥生初、中期的。这些遗物、遗迹说明一个事实，即当日本列岛上其他地区生产力还很低，可能还停留在使用石器的原始时代时，北九州地区已进入应用金属器和种植水稻的时代了。

生产力的发展是逐渐的，弥生时代是以种植水稻的农耕经济为主，但仍然还会有以渔猎为主的采集经济存在。不仅在弥生前、中期如此，即到弥生后期，也还存在着半农半渔（猎）的状况。这些，可以在《魏志·倭人传》的文献中见到，也能在出土的住居遗迹中见到。

采集经济，主要是依靠渔猎。渔猎对象的移动性很大，所以依渔猎为生的人类，其居住地点也需随渔猎对象的移动而定；从而发生移居频繁、居地多依山傍水，并且也不一定要聚族而居等现象。可是，进入农耕经济以后，由于种植水稻需要技术和协作，粮食生产又需要一定时间，生产所得的粮食也不用随得随食，能加储藏，所以对住居的要求，就和采集经济时代不同；不但可以相对地安定，而且也要求有多数人聚居。因此，从居住遗迹的变化上，也可以观察到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作为绳文时代遗物的石刀、石镞、钓针等，多数是在贝冢附近发见，而贝冢又多半分布在山水附近，这说明绳文时代人类生活的情况。进入弥生时代后，就不一样了，现在所能见到的弥生时代最早的居住遗迹是福岡县的板付遗迹。^②这个遗迹存在的时期，虽还无法确证是属于弥生前、中期，但在近畿地区发见的弥生中、后期的遗迹比，显然是要早些。板付遗迹中，虽不见

^① 汉镜，泛指前汉镜和后汉镜两种。

^② 冈崎敬、森贞次郎：《福岡县板付遗迹》，收入《日本农耕文化之生成》书中，日本东京堂1961年版。

有住屋的遗迹，但有一圈环濠，环濠内外还有作为储藏仓库用的穴仓；不过，其构造基本上还和绳文时代的住居相似，规模也没有在近畿地区发见的大。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在北九州地区虽已进入农耕经济，但规模还不大。居住在环濠内的家族数，比采集经济时代要多些，但并不很多；穴仓说明他们当时生产所得的粮食，已有余裕，可供储藏；环濠的存在，更说明他们已经定居，因此要有环濠那样的深沟以自卫，防备野兽或敌人的袭击。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见过，所不能比拟的。

弥生中期以后的住居遗迹，又和板付遗迹大不相同了。例如静冈县的登吕遗迹，不但规模大，而且其结构也不是竖穴或半地下，而是建立在地面上的了^①；大阪府堺市四池和和泉市池上等遗迹的规模则更大。^②从现在发掘出来的遗迹看，当聚居的住户不多时，住屋四周就挖沟（如福冈县比惠遗迹）；到住户多至成群之后，其住屋周围就挖环濠。因此，环濠的大小，就可以说明住居的规模。到现在为止，虽因日本在这方面的材料还不多，无法判定其全貌；但单就目前发掘所得，也大概可知道一些。像大阪府安满遗迹，中期的环濠东西长 200 公尺；到后期则更大，北沟和南沟之间的距离，竟达 500 公尺。^③这种变化，说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日本列岛上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逐渐由散居而聚居了。

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从墓葬中随葬品的变化上见到。在代表绳文时代的贝冢遗迹中，虽可以见到有些制作相当精巧的小型土器随葬^④；但属于生产工具的随葬品，却都是石制的。进入弥生时代以后，随葬品中，尽管还可以见有石制品，但已陆续发见有铁制品和青铜制品了；尤其是青铜器的存在，更是弥生时代的一大特征，因有称弥生时代为“青铜器时代”的。^⑤

一般在谈到金属器文化时，都以铁器作为代表；就在日本，也有人将弥生时代的金属器文化称为铁器文化的。但从铁器传到日本列岛的情况和以后的发展看，可以知道，单从铁器的情况是很难说明当时生产力变化的。

铁器传到日本，最早是在绳文后期，可能比青铜器的传入要早一些。铁

① 日本考古学会：《登吕》，每日新闻社 1954 年版。

② 大阪府堺市四池遗迹是 30 万平方公尺，大阪府和泉市池上遗迹的面积，则为五十万平方公尺。

③ 佐原真：《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日本历史》第 1 卷，岩波讲座 1980 年版，岩波书店。

④ 神泽勇一：《金子台遗迹之绳文时代墓地》，第一生命保险会社 1966 年版。

⑤ 森浩一：《铁》，社会思想社 1974 年版。

器传入后，首先是应用，以后才是制造，二者间相隔很久。从现在日本列岛上所见到的出土铁器遗物来看，可以认为在弥生前期，只有在九州地区使用铁器；中期以后，日本各地就普遍地使用铁器了。那时，日本列岛上大部分地区，都能制造铁器。

日本列岛上较多地发见铁器遗物和遗迹，是1950年以后的事。在所发见的铁器遗物中，属于弥生前期的，到现在为止，只知道有三处：两处九州，一处是在和九州相接的山口县。（奈良县的唐古遗迹中，也曾见到有铁锈痕迹的鹿角制刀柄。^①有人认为，唐古遗迹所在地是个低湿地，水分多，湿度大，铁器又易于生锈腐蚀，难以保存，所以没有铁器遗物留下。但从鹿角制刀柄上的铁锈痕迹，却可以证明在弥生前期，近畿地区也曾使用过铁器）。

日本列岛上使用铁器，当然是由朝鲜半岛传入的。朝鲜半岛上很早就会冶炼和制造铁器，朝鲜和日本相距很近，自古就来往频繁，因此朝鲜冶炼铁器的技术，必然会传到邻近的日本列岛。弥生前期日本列岛上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就是和朝鲜相距不远的九州，尤其是北九州，那里不但已大量使用从朝鲜半岛传入的铁器，而且还传入了冶炼、制作技术，开始就地生产了。从现在发见的遗物知道，他们最初制造的是铜戈形的武器。现在在九州地区，即使在隔海的对马岛上，都曾发见过铸造铁器的铸型（范）和小规模的化铁炉、铁渣的遗迹，这说明当时在那里制造和生产过铁器。根据遗物和遗迹证明，进入弥生中期以后，不仅在九州地区，连远离九州的一些穷乡僻壤也都使用和制造铁器了。例如在宫城县宫户岛渔村遗迹中，发见过铁制的铊；东京伊豆群岛中的利岛上，出土过一把铁制小刀；甚至连神奈川县三浦半岛的一些洞窟中，也发现属于弥生中、后期铁器的遗物。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列岛上使用、制造铁器已很普遍。

在这些铁器遗物中，令人瞩目的是铁斧状的铁器遗物。就目前在日本列岛上所发见的铁斧状遗物的形状有两种：一种就像我们今天使用的铁铲那样，用一块方形铁板，将其一端的两边向内弯卷，装上木柄使用。这种铁斧，在日本称为袋式斧，大小约十公分左右，主要的出土地点集中在九州；最远的东限，也仅至广岛县。另一种则是类似磨制石斧那样的板状斧，虽不如袋式斧大，不过五至十公分左右，但有刃，有单刃、也有双刃，其出土地

^① 末永雅雄、小林行雄、藤冈谦二郎：《大和唐古弥生式遗迹之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

区则在日本列岛的关东、中部地区，西限也只到广岛县，九州地区仅见过二例。^①这两种铁斧的出土地区，大体上和青铜器的分布范围相同；而这两种铁斧，都是属于弥生中，后期的。

朝鲜半岛上也曾见过不少袋式铁斧出土，九州地区发见的袋式铁斧，即使不直接来自朝鲜半岛，也是仿制的；和铜剑、铜戈、铜矛等铜利器一样，都不是日本列岛上所独创的，何况两者的分布圈又相同。^②袋式铁斧和铜利器的制造，都足以说明当时九州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而分布圈和铜铎相同的板状铁斧，也和铜铎一样，并没有在中国或朝鲜见过有出土，可以认为是日本列岛上所独创的，根据磨制石斧而自行制造的。从其有单刃和双刃的情况看，可以想象，那时因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使用铁斧的范围已较广。就是说，自制这种板状铁斧时的生产力，无疑要比使用、制造袋式铁斧时要进步。因此可以从板状铁斧的制作和分布区域等情况中了解到，弥生后期在铁器使用和制造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力水平。

弥生中期以前，九州地区，特别是北九州一带之所以成为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原因只有一个。即当时列岛上所吸收、输入的先进文明，都是通过朝鲜半岛而来的；九州由于具备地理上邻接朝鲜半岛的优越条件，最早也最多地吸收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先进文明。当时列岛上其他地区，都还很落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九州，尤其是北九州独占了这种先进文明，以后，再由那里逐渐向列岛上其他地区传播。但是，从今天见到的出土遗物，还无法说明九州地区在输入和吸收这种先进文明之后，曾经有过消化和创造的痕迹。

从历史的发展论，经由朝鲜半岛而传入日本列岛的中国大陆先进文明，曾推动、促进和提高了日本列岛上的生产力水平。到弥生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过去绳文时代那种因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的地区间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了。到铜利器所代表的时期，九州地区的生产力在列岛上遥遥领先，成为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远非其他地区

① 川越哲志：《弥生时代铁制工具之研究——关于板状铁斧》，《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3号，1974年。

② 森浩一：《铁器的分布》，收入上田正昭、森浩一、山田宗睦：《日本上古史》，筑摩书房1980年版。